

# 立法能管住景区乱涨价吗？

赵勇

## 今日论语

前段时间，湖南凤凰古城围城收费，引发人们的极大不满。虽然有最新消息称，古城经营方迫于舆论压力已经不再严格检票，游客可自由进出，但此事引发的“景区涨价何时了”这一担心仍值得继续追问。

似乎是对凤凰古城收费一事的回应，正在审议的旅游法草案明确规定：景区涨价必须提前半年公布方案，并且必须听证，不能说涨就涨。针对不少景区的另行收费现象，草案也明确提出“不得通过增加另行收费项目等方式变相涨价”；“另行收费项目已收回投资成本的，应当相应地降低价

格或取消收费”。  
很多人大声叫好，说这是法律给景区涨价套上了紧箍咒。这话当然不错，在专门的法律中明确景区涨价必须听证，很有必要。但同时，也不能就此认为，有了这个规定，便等于景区随意涨价就会绝迹，一方面，法律规定能不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，要打个问号。另一方面，听证会是不是会走过场，同样也是疑问。

对于公共景区涨价，现在也不是一点没有约束，不仅物价部门要审批，发改委也是要过问的。但景区涨价往往能够“心想事成”，不仅物价部门那里可以“顺利通过”涨价方案，就算是发改委专门发文禁止景区借国庆等长假涨价，也经常被很多景区置之不

理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景区门票收入的巨大利益使然，另一方面，则是因为很多地方政府也乐于在景区门票中分一杯羹，所以对涨价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就像这次的凤凰古城收费风波中，凤凰县政府就是凤凰古城景区管理服务公司的两个股东之一，当地政府能从每张门票中拿到60块钱。地方政府成了景区股东，指望他们严格控制景区涨价，岂不是跟割自己的肉一样难？

一旦旅游法付诸实施，各地都将按规定开景区涨价听证会，但如果跟一些地方的水电气涨价一样，听证会动不动就搞成“听涨价”，所谓“景区涨价必须听证”，岂不是徒具形式？搞不好，今后景区涨价还会更加理直气壮——

我是按法律规定听证过的，你还能说我什么？

破解景区涨价难题，一方面固然需要专门的法律规定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还是打破一些地方政府靠景区生财的利益链。你不能指望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像杭州市政府那样有远见，早就让西湖景区免费开放，靠衍生服务提升旅游经济。能指望的，只能是本就该为全民所有的公共景区从制度上彻底回归公益，该免费的免费，该象征性收费的象征性收费，这样才能断掉一些地方政府“吃景区”的念头。正如旅游法草案里面提到的，公益性的城市公园、博物馆、纪念馆等，应当逐步免费开放。公园和博物馆做得到的事，景区也应该做得到。

## 新民随笔

# 办个“民工讲习所”吧！

林明杰

城里人和民工的矛盾，绝大多数缘于两者生活经验之截然不同。

譬如，挤公交车，城里人经过长期的磨合，大多学会了在公交车上“夹着尾巴”做人。尤其在日本，你可以看到地铁上的人们是如何紧缩自己的形体，避免触犯别人。但从“广阔天地”初来乍到的弟兄们怎能理解城里生活的逼仄，大多会像京剧花脸般拉开架势亮相。城里人跟他白眼，他说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。

我真心佩服那些从山沟沟跑到大城市来谋生的同胞。他们过去或许连公交车都没坐过几次，现在却要在错综复杂的城市里学会坐地铁，找工作，合伙租房，学会各种周旋并生存。

设身处地想想，如果我是他们，我行不行？我是否会精神崩溃？

我们责怪“乡下人”不讲卫生，但想过没，他在家乡，往地里撒泡尿，在山里吐口痰算什么？他怎知这在城市环境会造成疾病传播？

我们责怪“乡下人”不遵守交通规则，乡下田埂有红绿灯吗？

我们怪“乡下人”喧闹无礼，但可知他们那里就是这样从这个山头往那个山头，从这个田头往那个田头大声嚷嚷的。

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之必然。伴随着这个进程，城里人与“乡下人”的矛盾在西方也一样发生过。玛丽莲·梦露演过一个电影，一个刚进城的牛仔爱上了她，以“蛮横无礼”的方式追求她而受挫。最终，牛仔学会了城市文明的礼仪和规则，讨得佳人芳心。我觉得这部片子其实是美国城市化进程中的“教育片”。

对大量从农村涌入城市的民工，我们有必要提供这种教育，深入到工地、厂房，帮助他们了解城市，学会如何在这里乘车、过马路、找工作、租房子、维权以及其他有助于他们顺利工作、生活、交际的知识和宜忌。

要站在为他们着想的立场来设计课程，这样才不会引起反感。

何不以当年开办“农民运动讲习所”的热情，积极主动地为进城务工的同胞提供些必需的知识装备。这样做为我们带来的，不仅仅是改善当下的一些矛盾，可能还会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、民族素质的提升产生深远影响。

# 不干预微信收费是尊重市场

## 新民网论

工信部新闻发言人、通信发展司司长张峰近日表示，微信等新业务是否收费应该由市场决定，工信部不会进行干预。

微信收费问题近期引发强烈关注，工信部最终站到尊重市场的立场上，值得肯定。免费微信冲击传统的语音、短信通讯方式，本身是正常的市场创新行为，在技术进步迅速的通信市场，这种颠覆传统盈利模式的变革此前并不鲜见，也绝不会仅此一次。如果引来政府干预，那企业就会面临政策不确定性风险，可能伤害企业的创新意愿。因此，不仅是对微信是否收费不应干预，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，政府一般都应保持监管而非参与的态度。

然而，工信部提出不干预，并不代表微信就摆脱了收费命运。工信部从最初的“微信可能收费”立场退回到“不干预市场”，多少是一面倒的公众舆论影响所致。但几大通信运营商的管道垄断优势还在，向微信服务提供商提出收费要求，后者可能难以拒绝。另一方面，如果几大运营商不及时提高网络容量，也可能造成现有的网络通道满足不了需求，甚至造成局部的网络瘫痪、通信困难，这种局面需要预防。政府不干预

收费问题，但维护市场的基本秩序却是职责所在。

政府尊重市场，就是把选择权交还给消费者，最终收获的是内需市场健康发育，企业竞争力

提升，经济结构改善。因此，政府应恪守“守夜人”的职责，既不越位，也不缺位。

(新民网评论员，网址 www.xinmin.cn)

## 新民新语

# 先救谁？

左妍

妻子和母亲同时落水，先救谁？我原本以为这个无聊的命题不会再被人们关注，没想到，这次雅安地震，类似的难题真实上演：地震当天，雅安市民李某面临一个两难选择：年迈的父母在对面哥哥家的厨房里，9岁的儿子在自家二楼的卧室，距离不到10米。地动楼摇之间，他第一时间冲上楼，救下了儿子；但当他迅速下楼时，却看到父母被屋顶坠落的砖块砸伤。

两位老人被救到院后，母亲一直背对儿子，不理睬他；尽管事后母亲也说“我们不怪儿子”，但李某却对父母的受伤深深自责。

这件事情在微博上越来越热，甚至引发了激烈的道德审判。父母和儿子，到底先救谁？其实，这个问题根本不值得拿来做新闻，多年来，各种相似命题已被吵得不可开交，至今都没有明确答案。

先救谁？坐而论道毫无意义。旁观者通常有足够时间去权衡，然后分析出各种道理，找出所谓的满意答案。然而，这些经过“深思熟虑”所给出的答案，未必派得上用场，甚至可以说，这种“思考”掺杂了太多虚幻和狭隘的东西。不管在母亲和妻子之间，还是在父母和幼子之间，在危急时刻，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思考，你最终做的决定，完全有可能和最初的设想截然不同。

因此，先救谁，并不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选择题，而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。如果有几人同时处于危难中，显然应该去救近的、容易救活的；舍近求远，反而可能使两者都救不下来。

地震面前，等待救援的弱者们都已褪去了身份标签，因此李某不管选择先救谁，都是合情合理、无可厚非的，没有人可以假道德的名义指责他。

每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，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，即使是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也一样，只要还具备做人的良心，都得奋力去救，根本来不及思考更多——先救谁或许只是一种潜意识，无关爱的多少。

而那些在网上激辩“先救谁”并对此上纲上线的人，在我看来，或许只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意淫道德罢了。空谈“先救谁”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道德陷阱。



## “牛车”进车展

上海车展门口的“黄牛”，拨通场内熟人电话，几分钟后就有人带着几张证件走出展馆，将证件交到“黄牛”手上，与观众现场交易后，观众就跟着熟人蒙混入场。  
天呈 画

## 自由谭

百年院落“内史第”，上周经修复重新开放。这里，曾居住过宋霭龄、宋庆龄、宋美龄、宋子文及黄炎培、胡适、黄自等十多位名人，修复开放的意义，自不待言。然而，笔者闻讯，有喜亦有忧。喜的是，经20多年各方奔走、呼吁、努力，这座江南名宅终于修复，这为浦东新区增添了一个在海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文景观；忧的是，修复“内史第”工程最终耗资竟达1.2亿元，前后费时二十年，令人有点痛惜。因为，这些代价原来可以避免。

若当初有一点文化保护意识，这座拥有170多年历史的清代院落就不会惨遭摧毁。1986年7月，黄炎培之子、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致信有关部门说，“内史第”西厢房是宋庆龄的出生地，他父亲指着“内史第”亲口告

诉他：“这就是了不起的宋庆龄出生的地方！”遗憾的是，这封信没有引起重视。

更令人痛惜的是，黄万里教授来信后仅相隔半年，原川沙县有关部门经过犹豫，还是作出拆除“内史第”、改建新房的决定。他们认为，“内史第”地处川沙镇黄金地段，改建新房既可解决居民住房，又可增添商业网点。再说，宋庆龄是否出生于于此，也只有黄万里在说，他是教授，不是领导，可置之不理。而且，旧城区改造计划已定，有关部门也支付了76万元居民拆迁费。如停建，这76万元由谁来出？由此，只算了这76万元，没算历史文化遗产是无价的。建了一幢居民楼，丢失了一座无价之宝。如今看来，这目光是

俞亮鑫

短浅的，其教训是惨重的。

实际上，若早点醒悟到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，也不至于要耗费上亿元。因为，十年前，浦东新区就宣布启动“内史第”修复工程，当时公布总投资仅为2500万元。但十年过去，动迁费、材料费、建造费、人工费……逐年上涨，工程难以上马，久拖不决，原先投资不断追加，就变成了今天的1.2亿元。而且，媒体最早爆出宋氏姐妹在“内史第”的系列报道是在1994年，也就是说，二十年前就有人呼吁修复，但当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。尽管宋氏家族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一页，“内史第”修复工程立项一直迟至2003年才有眉目。等待了几乎整整十年，二十年前的投资无疑

会大大少于十年前的2500万元。

经历前后20多年折腾、犹豫、拆毁、修复，如今“内史第”这一百年名宅终于重新展露新姿。前来参观者络绎不绝，团队参观已预约至两周后，足见社会欢迎程度。但有些遗憾是花钱都无法弥补的。如三进院落当时被毁三分之二，若不是黄炎培故居已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并由陈云题写匾额，恐怕早就全部被毁。如今，重建部分毕竟不是历史原物，其历史人文价值已大打折扣。再说，为给门前主干道让路，“内史第”还向里缩进约4米，且少了一堵门墙，再也无法恢复历史原貌，这将成永久的历史伤痛。

回顾如此沉重的历史伤痛，我们不能让这些蠢事再次发生。